

【法学】

# 贪污罪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 ——论中国法律应确立被告人举证责任

许峰<sup>1</sup>, 王泰宁<sup>2</sup>

(1. 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吉林大学法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贪污罪被告人将赃款去向辩解为用于公务, 导致司法机关无法处理, 其原因在于现行对举证责任的规定有其不合理性。国外多见对被告人举证责任的规定, 这不但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反而能更好地实现公正和效率, 且具有可行性。中国也应建立被告人举证责任制度, 在某些情况下由被告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比如在行为人将赃款去向辩解为用于公务的场合, 对“用于公务”的举证由被告人来完成。如果不能完成, 就视为贪污罪成立。

**关键词:** 举证责任; 犯罪构成; 赃款去向; 被告人

中图分类号: D924.3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4)03-0067-05

## Production burden of the use of illicit money in crime of corruption ——system of accused person bearing the production burden should be established

XU Feng<sup>1</sup>, WANG Tai-ning<sup>2</sup>

(1. School of Law,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Law,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Prosecutor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to deal with the accused person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when they state that they have used the illicit money in line of duty, based on the unreasonable system of production burden. Accused person is expected to bear the production burden in foreign countries besides prosecutor, for it is possible and beneficial to achieve justness and efficienc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We should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accused person bearing the production burden, regulating that in some instances the accused person must bear the production burden for what they state. If the accused person with crime of corruption have stated that they have used the illicit money in line of duty, he must put forward the evidence or he will lose the sue.

**Key words:** production burden; constitution of crime; the use of illicit money; accused person

贪污罪赃款去向是否影响定性在司法实务中的争论由来已久。实践中, 嫌疑人往往将赃款去向辩解为用于公务, 导致司法机关举证的困难, 从而逃避法律责任。因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对赃款去向的举证责任没有专门做出规定, 我国刑法学理论也少见对此问题的研究, 故本文拟就此问题谈一些粗浅

看法。

### 一、赃款去向举证责任之立法规定的不合理性

中国学者大都认为, 中国刑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赃款的不同去向做出能够影响定性的专门

性规定。行为人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一经成立,犯罪及其数额便作为一种结局不可回复或逆转。赃款如何处分使用,只是去向问题,并不能影响贪污罪的成立。至多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sup>[1]</sup>。但是,在行为人将赃款用于公的场合,行为人并不具有为贪一己私利而侵害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主观故意。在此情况下,不考虑赃款去向显然是不妥的。此时就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

举证责任有两种含义:其一,对于某种事实,当事人无论如何必须有证明它的行为。如不履行这一义务,就要承担法庭不考虑该事实的危险。这可称为形式的举证责任。其二,对于某种事实,尽管调取了证据,但最终仍不能证明时,必须做出对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不利的判断。这可称为实质的举证责任。<sup>[2]</sup>中国学者曾将其近一步概括为: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中的一方或双方依法对各自主张的事实承担的提出证据的法律义务,当案件最终真伪不明时,负举证责任的一方需承担不利法律后果。它与证明责任在行为内容、证明对象、主体、证明要求及诉讼目的的实现上都有严格区别<sup>[3]</sup>。

检察机关是公诉案件中的一方,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那么,就产生了如下的问题: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赃款去向是否属于检察机关举证的内容?检察机关对赃款去向承担举证责任有没有可能?在无法对赃款去向加以证明时该如何处理?

贪污罪的构成要件中不见对赃款去向的规定,但是赃款去向却影响着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故意内容。在行为人将赃款用于公的场合,说明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主观上并不具有为贪一己私利而侵害公职人员职务廉洁性的故意。只有行为人将赃款占为己有或用于个人用途,才能说明他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推定主观故意的存在。所以赃款的具体去向具有说明是否具备贪污罪主观方面要件的意义。而我国的犯罪构成四大要件,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在对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进行评定时,对各要件适合与否的评判是在假定其他要件存在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有某一要件不存在,其他要件齐备的假定即被证伪,犯罪就不成立<sup>[4]</sup>。在贪污罪中,即使其他构成要件都符合并齐备,如果缺少主观方面要件,贪污罪也不能成立。

此时,赃款去向关系到贪污罪能否成立,是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的关键。在贪污罪成立后,赃款的具体去向还影响对行为人量刑的轻重。因此,结合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赃款去向理应成为检察机关举证的内容。

但是,实践中,检察机关对赃款去向进行查证时却存在困难。因为赃款去向形式多样,难以查清;尤其在行为人辩解为用于公的场合,真假难辩,有时根本无法核查。而且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被告人,对赃款的具体去向知道得最为清楚,甚至是唯一的知情人,但是他并没有举证的义务,或者不排除他毁灭证据的可能。这就为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困难。加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对有关犯罪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在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加以反驳并引起裁判者的合理怀疑时,检察机关的举证就被认为未达到证明要求,从而可能被退回补充侦查或被撤消起诉以及得到不利的裁判。所以,检察机关在侦查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防止不利的后果,可能采取疑案从无的做法,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有放纵犯罪之嫌,且不利于加强对日益严重的贪污案件的打击力度。

由以上分析可知,赃款去向对贪污罪成立的重要意义,证明赃款去向的困难和中国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过高要求导致赃款去向的举证成为指控贪污罪的瓶颈。检察机关若未达到证明标准就必须承担不利后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赃款去向这一构成事实之外的事实成为检察机关在举证过程中的一个难题。而且,举证难的问题并不单单存在于贪污罪中。在涉及到“一对一”证据和证明主观方面要件的证据时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笔者认为,若试图解决这一难题,不妨借鉴他国立法的经验,将这一部分的举证责任转由被告承担,而且这与我国刑事司法的理论与实践并不矛盾。

## 二、其他国家关于被告人 举证责任的规定

一般而言,被告人没有举证责任。承认被告人的举证责任被认为是职权主义的表现,并且与无罪推定的理念背道而驰<sup>[5]</sup>。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既无必要性,又无可能性,而且会导致控诉方推卸责任,降低诉讼效率,被告人地位恶化,刑讯逼供等行为的产生<sup>[6]</sup>。但国外却不乏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立法例。有学者曾经就此做过

考察,法国、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立法都存在对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相应规定<sup>[7]</sup>。

### (一)国外规定被告人举证责任的原因

司法推定制度存在的前提下,被告人对某些有利于自己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不但不违反无罪推定,而且有利于实现诉讼公正。(证明方法的)推定即根据一事实的存在直接认定另一事实存在,而无需另外进行证明,若相对一方对推定有相反主张,则需要加以证明。在西方国家,存在着广泛的推定制度,如无罪的推定,即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就应推定为无罪,无需就无罪的事实进行证明;排除违法性及阻却责任性事由不存在的推定,即证明被告人有构成犯罪的事实,就推定其有违法性及可责性,而无需就其不存在排除违法性及阻却责任性的事由进行证明,而被告方若主张其具有排除违法性及阻却责任性的事由,则必须加以证明。很明显,推定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是推定的后果把一方的举证责任转移到另一方,体现了司法向不同诉讼主体利益的倾斜。西方国家刑事诉讼中存在大量的有利于控方的推定,其适用必然会导致部分本应由控方承担的举证责任转嫁给被告方。在此情况下,由被告人对某些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如阻却责任性事由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似乎有违背无罪推定之嫌,但也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罪推定。因为无罪推定是指被告在未经依法公开审判证实其有罪之前,应推定为无罪<sup>[5]</sup>。有罪推定则与之相对。无罪推定或有罪推定是程序上的假定,而司法推定制度则是对实体问题的证明方法,二者并不是一对矛盾中的双方。在无罪推定这一前提下,某些特定案件中,当控方的证明达到一定要求时,由被告人对某些有利于自己的事实进行举证,被告人所承担的不是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而是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种责任对被告人而言,具有义务和权利的双重性质。”<sup>[8]</sup>再者,刑事推定是以一定的客观事实和待证事实与已知事实的客观联系为基础的,有别于有罪推定没有根据的擅断。在此基础上,由被告人对有利于自己的事实和主张加以举证,更有助于明确案情,实现实体公正和个案公正。

被告人对这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更有利于效率的实现。效率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刑事诉讼中所讲的效率就是以最少的司法资源投入获得最大数量的刑事案件处理。司法资源本身具有有限性,而且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还要受到时空、诉讼制度等的限制及犯罪人的阻挠。若没有被告人举

证加以配合,仅仅依靠司法机关自身的活动,有些事实往往很难查清,或者即使查清也不得不耗费更多的诉讼资源。而“诉讼本身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这是因为“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推迟刑罚尽管也给人们以惩罚犯罪的印象,然而,它造成的印象不像是惩罚,倒像是表演。并且只是在那种本来有助于增加惩罚感的、对某一犯罪的恐惧心理已在观众心中减弱之后,才产生这种印象”。<sup>[9]</sup>所以,规定被告人对某些特定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有助于发挥被告人的积极作用,调动这部分闲置的资源,减轻司法机关的诉讼负担,加强诉讼的社会效果,提高诉讼效率。

被告人对这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必要且可能。就某些犯罪事实,如被害人承诺、出于意外、激于义愤等而言,被告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相比具备证据上的信息优势,甚至可能是案件唯一的知情人。在这种情况下,由被告人对这些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比由控方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公平和便捷。因此,法律直接规定了被告人的举证责任。美国的制定法就规定,如果某人因饮酒使血液中酒精比例超过一定限度,而他身边刚好有一辆汽车,这时只有他能证明他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开车的,才不会被判有罪。<sup>[7]</sup>因为,他对自己此时能否开车具有证明的充分必要性和唯一可能性。如果由控方对此进行举证,则既不公平,又不经济。

综上,在无罪推定原则的保障下,如果某些事实对被告人有利,而且存在被告人有举证的可能,则可以规定被告人对这些特定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的举证责任才具有合理性。但被告人的举证责任毕竟只是控方举证原则的例外,因而存在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证明要求也低于控方举证的证明要求。

### (二)被告人举证责任的立法规定的特点

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各国举证责任的分配标准与该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紧密相关,被告人对基本事实以外的,并且不能由基本事实合理推定出的那部分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比如日本的学者就主张:“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要以犯罪构成要件概念为标准。对于犯罪事实,检察官有证明责任。这里所说的犯罪事实,是犯罪构成事实,即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应当成立犯罪的事实。对于构成法律上的妨碍成立犯罪理由的事实,被告人一方(被告人及辩护人)有证明责任。所谓构成法律上妨碍成立犯罪的理由的事实,最终就是违法阻却理由或责任阻

却理由。对于可成为法律上规定的加重处罚理由的事实, 检察官方面有证明责任。对于可构成法律上减轻或免除刑罚的理由的事实, 证明责任在被告人一方。<sup>[2]</sup> 这与日本的犯罪构成理论将对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评价分为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及有责性三个层次是有关的。其中, 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评价是基础, 行为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符合性, 那么就可以推定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对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证明由检察官承担。而如果被告人主张存在违法阻却理由或责任阻却理由, 就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否则该主张将不被考虑。

在英美法系国家, 犯罪构成包括两个层次: 犯罪本体要件和责任充足要件(合法辩护理由)。犯罪本体要件是从正面、积极的角度规定具备哪些条件, 行为才能成立犯罪; 责任充足要件是从反面、消极的角度规定在哪些情形下, 即使行为符合本体要件, 也不构成犯罪或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本体要件是一般, 责任充足要件是例外。通常情况下, 行为符合本体要件, 行为人即构成犯罪并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提出精神障碍、警察圈套等合法辩护理由, 则要就此承担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犯罪构成理论密切相关, 是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反映的是司法实践中的东西, “犯罪构成模式是司法运作‘定罪过程’的模拟, 犯罪构成模式反映定罪过程是显示刑法两种功能(保卫社会 and 保障人权)的要求”。<sup>[10]</sup> 犯罪构成作为理论体系, 具有逻辑上的先在性和事实上的派生性。逻辑上的先在性, 是指它对立法和司法具有指导作用,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理论先行”。事实上的派生性, 是指它作为上层建筑, 必然对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有所反映。因此, 它与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体现出两方面的特征: 一方面, 举证责任的立法模式对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会产生影响性的作用; 另一方面, 犯罪构成理论对举证责任分配的立法模式也有指导性的作用。<sup>①</sup>

从证明要求来看, 被告人举证的证明要求要低于控方举证的证明要求。在英美法系国家, 辩护方的证明只需达到优势证明程度, 即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 或有初步证据, 即在事实裁判者心目中形成合理的怀疑即可。而控方的

举证则必须达到内心确信或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在日本, 检察官对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必须证明“没有合理的疑点”, 如果还残留着合理的疑点, 就必须宣告无罪。而被告人对构成法律上的妨碍成立犯罪理由的事实的证明则没有必要非达到与犯罪事实相同的最高的确信程度, 即“没有合理的疑点”不可。它只要能被“优势证据”所证明, 就是说, 与否定它的证据相比, 肯定它的证据一方要占优势就可以了。<sup>[4]</sup>

可以想见, 在刑事诉讼中, 一旦被告方履行了举证责任, 而且使事实裁判者心中产生了合理怀疑或认为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可能性更大, 被告方的证明责任即已完成。至于该主张是否属实, 则不在被告人证明的内容之列。如果控方对该主张的否定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该主张就推定成立。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权益, 实现刑法的保障机能的。

由此可以总结出国外关于被告人举证责任立法的特点: 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 只有当控方已对基本的犯罪事实履行其举证责任, 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之后, 被告人才需要对法定的应由其承担举证责任的减免刑事责任事由进行证明<sup>②</sup>, 从而动摇控方主张的可信性。辩方也可以不对有关事由加以证明而直接申请法官做出判决。

### 三、中国应建立的被告人 举证责任模式

(一) 被告人对个别构成事实和部分非构成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如前所述, 举证责任的分配与犯罪构成相关。举证内容, 也就是待证事实的划分是以它在具体犯罪构成中的意义为标准进行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犯罪构成都呈现出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 各要件之间存在着立体重合关系, 对事实进行多次评价。他们的举证责任分配模式也具有层次性, 基本事实与特定的辩护性事由被区分开来。而我国的犯罪构成则是耦合式的逻辑结构, 各要件之间是平面的“横向重合关系”<sup>[11]</sup>, 对事实进行一次性的综合评价, 没有对构成要件进行多角度的不同评价。那么, 以构

① 关于犯罪构成到底是法律规定还是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理论界还存在着争议。但是这已经超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范围。对这个问题, 我国学者曾有过精辟论述。具体请参见李洁: 法律的犯罪构成与犯罪构成理论, 载《法学研究》1999 年第 5 期。

② 考虑到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中对该种事由的不同理解, 故采取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广义的)减免刑事责任事由一词以便涵盖阻却责任事由与阻却违法事由、正当性辩护理由与可宽恕性辩护理由、法定减免刑事责任理由与酌定减免刑事责任理由、减轻刑事责任事由与免除刑事责任事由。具体请参见张旭:《减免刑事责任理论比较研究》, 长春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146—151 页。

成要件为标准分配举证责任时,不妨将构成要件本身加以区分,由检察机关对大多数构成要件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被告人对某些构成要件的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若被告人无法举证或未达到要求,则推定该要件存在。需要由被告人举证的说明构成要件存在与否的事实应该限于以下的事实:为控方所举证事实能合理推出的结论的例外,并且控方难以举证而被告人易于举证。比如,目的犯中不存在特定的目的,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明知”的犯罪中不存在“明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等。同时,对于某些构成要件之外可能影响量刑的事实,或是某些程序性事实,也可以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

规定被告人对某些事实的不存在负举证责任,还需要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推定这些事实存在的制度。如前所述,有利于控方的推定制度的存在是被告人举证责任得以产生的逻辑前提。在被告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做出对控方有利的推定也是刑事诉讼的必然归宿。推定与举证都是证明的方式,二者在主体和地位上似乎是对立的,但是在作用上则是互补的,缺一不可。而中国刑事诉讼中虽然也存在着推定,如对责任能力的推定,精神正常的推定,但是却没有就此形成理论,更没有在立法中明确将之规定为一项制度。因此,必须确立相应的检察机关推定制度,作为对被告人举证责任制度的保障。如在被告人举证因果关系不存在的场合,检察机关就可以对因果关系的存在进行假定,如果没有被被告人证伪,因果关系存在的假定就推定为真。

#### (二)对被告人证明的要求应该具体分析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取证、举证能力还不是很强,无法与司法机关相提并论,这是无可争议的客观现实。但是考虑到被告人只是对极少一部分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只有在被告人对该事实具有举证的可能性时对被告人举证责任进行规定才有现实意义。所以,笔者认为,对被告人的举证要求不宜一概而论,而是要结合立法的初衷进行考虑。如果就某罪而言,规定被告人对特定事实负举证责任主要是出于刑法保障功能的考虑,防止罪及无辜,那么证明的要求不妨定得低些,可以借鉴他国的规定,采用优势证明程度或者初步证明程度。如果确立被告人就此事事实负举证责任的目的是为了为了防止放纵犯罪,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保护功能,那么证明的要求不妨定得高些,完全可以要求

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综上,中国应该确立被告人的举证责任作为人民检察院举证责任的例外。在具体的犯罪中,如果被告人对某些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则被告人必须有举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出发点,由被告人承担该构成要件不存在的举证责任。同时还要建立检察机关对该构成要件的推定制度,在被告人不能证明时推定该构成要件存在。对被告人举证的要求可以视立法目的的不同而采取多种标准。只有作到如此,被告人举证责任制度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 四、中国贪污罪赃款去向 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论述了贪污罪赃款去向虽然不是构成要件的内容,却影响着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故意存在与否,因而对贪污罪的成立起着重要的作用以及检察机关在证明赃款的具体去向时所面临的困难。这根源于证明主观方面的困难性。行为人思想中的内容不能由客观存在的物品、痕迹直接表明,只能推定证明。如果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贪污行为就应该推定其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也存在例外,如该款项确实用于公务而非自己非法占有。如果要求控方对此种例外承担举证责任则不免流于苛责,可是若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被告人承担“赃款用于公务”的举证责任,则显得合理易行。也即由贪污罪嫌疑人对赃款去向承担举证责任是可能且必要的。与此同时,就应该建立检察机关的罪错推定制度,在行为人无法证明自己主观上没有故意时,就推定其存在故意。而且,为了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协调和加大对贪污罪的打击力度,被告人的证明程度应该达到最严格的确信,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那么,在关于贪污罪的诉讼过程中,如果赃款去向以外的所有事实都已经调查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应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具备犯罪故意。若此时行为人将赃款去向辩解为用于公务从而阻却故意,那么应该由行为人对自己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行为人不能做出证明并排除司法机关的合理怀疑,就推定为行为人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贪污的故意,贪污罪便成立。

(下转第90页)

身的精神,拼着性命为祖国抗战抢运物资。在这条长达 1 164 km 的国际交通线上,每日军用物资输入量保持在 300 t 以上,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长期抗战。机工们被誉为抗战救国运输线上的“神行太保”。

在回国华侨中,还有不少人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延安和其它抗日根据地。马来亚华侨工人彭士馨等 15 人组成的汽车司机回国服务团,携带南洋侨胞捐款和两部救护车,跋涉万余里,历经艰辛来到延安参加八路军,是最早到延安的归国侨胞,被延安人民誉为“华侨先锋”。先后到达延安的 300 多名华侨青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成立了“延安华侨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救亡活动和华侨统战工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体育运动、医疗卫生、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抗日的各个战场上,到处留有华侨奋战的脚印,也有华侨洒下的热血。1937 年淞沪抗战时,新加坡华侨 16 人组成决死队回国参战,除一人返回外,其余皆阵亡。滇缅公路上平均每天就有七八名华侨机工牺牲。南洋华侨林日尊在 1940 年 5 月 18 日日机空袭成都时驾机迎击,不幸中弹,壮烈牺牲。从爪哇回国的华侨,人称“双枪女英雄”的李林,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担任八路军 120 师第六支队骑兵营教导员,智勇双全,英勇作战,战果赫赫。日寇曾悬赏 5 000 元缉捕她。1940 年 4 月 26 日,李林在山西平陆的一次反扫荡中,在连续重创敌人后壮烈牺牲,年仅 24 岁。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从延安为她发了唁电,称她“不仅是我们的女共产党员的光辉模范,而且也是全国同胞所敬仰的女英雄”。<sup>[9]</sup>

所有这些为抗日救国捐躯的华侨英雄,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也是全体爱国华侨的光荣和骄傲。他们为民族存亡而奋斗而献身的壮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祖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千万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为祖国的团结统一,为民族的独立富强,尽了最大的努力和牺牲。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彪炳于史册。今天,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腾飞,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实现而共同努力奋斗。

#### 参考文献:

- [1]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M].香港:香港汇文书局,1979.
- [3] 杨国桢.陈嘉庚的故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4] 中国现代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4期)[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6] 陈树人.四年来的华侨爱国运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7] 华侨问题专号(第2卷,第2期)[C].上海:上海长风出版社,1943.
- [8] 曾瑞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J].抗日战争研究,1994.
- [9]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陈志和]

(上接第 71 页)

#### 参考文献:

- [1] 肖中华.赃款的去向不影响定性[J].法学,2000(9): 27.
- [2] 小野一郎著,王泰译.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
- [3] 闵春雷.对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重新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2): 29-30.
- [4] 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A].刑事法评论(第二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 [5] 蔡墩铭.刑事证明与举证[J].法学家,1996(5): 62—

64.

- [6] 周宝峰.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2): 10-11.
- [7] 陈永生.论刑事诉讼中控方举证责任之例外[J].政法论坛,2001(5): 73-75.
- [8] 游伟,肖晚祥.刑事推定与犯罪的认定[J].人民检察,2001(12): 13.
- [9] 贝卡利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J].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10] 储槐植.美国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 [11] 刘艳红.开放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杨彬智]